



二十世纪全纪录

1976

周丽琼 主编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十里长街送总理	1
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
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	5
天安门百万群众声讨“四人帮”，悼念周总理	6
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20
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27
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28
全世界沉痛悼念毛泽东	34
四人帮伪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	37
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粉碎.....	38
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中央主席、军委主席	55
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55
中央决定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55
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56
“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	58
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	58
我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59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59
1976：宋庆龄走出“文革”岁月风暴	59
1976年的中国科学院.....	100
我国专家考察神农架“野人”	103
小资料.....	104
世界部分	106

世纪回眸	106
苹果电脑上市	106
第十二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08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10
7 月印尼总统苏哈托宣布东帝汶成为印尼的一个省	111
1976 年，谢瓦尔德纳泽当选苏共中央委员....	118
小资料.....	121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十里长街送总理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4年秋回国后，曾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

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共5人）。国共全面分裂后，他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在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工作。他为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后，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当时驻在陕西西安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由于反对蒋介石拒绝抵抗日本侵略而集中全力反共，发动了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和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

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此后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职务。同年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宣布：旧中国一百多年来“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此后，周恩来长期处于外交工作的“第一线”，组织领导中国政府与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建交工作；具体指导同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地区的民间交往活动，开展广泛的人民外交，为日后正式建交创造条件。

1953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6月，他先后访问邻国印度和缅甸，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导了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逐步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和1955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先后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在大型国际会议上的重要“亮相”。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的卓越表现，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赢得“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的赞誉。

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周恩来先后对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友谊。在几次出访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一些邻国时，周恩来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精神，同这些国家首脑会谈，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作出重要贡献。在对非洲十几个国家的访问中，周恩来相继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及阿拉伯各国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等，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爱好和平、伸张正义，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平等对目互帮助的精神。在此期间，周恩来表现出的平等待人，善解人意，临危不惧，严守信义的大国总理的气度和风范，给各国领导人和人民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哀痛，举世震惊。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医院到八宝山数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自发来到这里，在严寒中肃立致敬，最后告别他们深爱的总理。灵车所到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一派悲痛景象。

12日至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北京各界群众、在京外国人士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沉痛吊唁周恩来。与此同时，更多的首都居民、机关于部、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仪式，深切悼念和缅怀自己的总理，寄托不尽的哀思。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人民群众追悼、怀念周恩来的主要场地。短短几天里，天安门广场花如海，人如潮，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在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南京、重庆、南昌、广州以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也相继出现类似悼念活动。

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

代表五千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遵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入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逝世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党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为中国和世界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也举行向周恩来默哀仪式，联合国下半旗致哀。

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天安门百万群众声讨“四人帮”，悼念周总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

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1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4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

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嫉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

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指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4月4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

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

(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这位负责人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这位负责人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

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发言中，这位负责人还讲了一些错话，这位负责人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会上，这位负责人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是同意这个建议的。

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这位负责人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这位负责人说：“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这位负责人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这位负责人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这位负责人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这位负责人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这位负责人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这位负责人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这位负责人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这位负责人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是可以解决的，这位负责人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这位负责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这位负责人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这位负责人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

这位负责人的意见，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这位负责人，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这位负责人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这位负责人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地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这位负责人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这位负责人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这位负责人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

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这位负责人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这位负责人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这位负责人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这位负责人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开了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这位负责人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